

冯天瑜 著

中国文化史断想

(第二版)

C101205

K204

129



201012055



冯天瑜 著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中國文化史新想

(第二版)

(鄂)新登字第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化史断想/冯天瑜著. -2 版

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1998. 3

ISBN 7-5609-0258-8

I. 中...

II. 冯...

III. 文化史-研究-中国

IV. K203

DK72 /14

中国文化史断想(第二版)

冯天瑜 著

责任编辑: 余俊 钱坤

*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昌喻家山 邮编:430074)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照排室排版

武汉大学出版社印刷总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875 插页:2 字数:325 000

1998 年 3 月第 2 版 1998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2 001-4 000

ISBN 7-5609-0258-8/K·3

定价:18.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 80 年代文化讨论热潮中涌现的优秀之作。作者以中国文化的特质为中心，以明清文化走向近代的曲折历程为重点，宏观立论，微观考史，自为经纬，成一家言。其中有对文化概念的历史追溯，对汉族文化类型的界定及成因剖析，对儒学重人文、轻自然特征及其经世走向的揭示，对明清之际及清代道光咸丰间这两个历史转折阶段文化的具体解析，有龚自珍、魏源、辜鸿铭、鲁迅等文化转型期代表人物的品评。本书还集中作者近十年为学术界多种文化学及文化史论著所撰序言，从中可以得见这一期间中国文化研究的侧影。

自序

80年代初期以来，我国哲学界、史学界、文学艺术界都有人致力于反思传统文化、比较中西文化、设计未来文化。有人把这种状况称为“文化热”。笔者对这一提法不尽赞同。因为，一方面，上述讨论和研究目前仅引起知识界部分人注意，广大民众多置身事外，而且参与这一讨论和研究的知识界自身尚未拿出有份量的成果奉献社会，故呼之为“热”，实在难免“自我陶醉”之讥；另一方面，称“××热”，很容易使人联想起以往多次出现过的由某种不科学的指导发动起来的“思想运动”。由于并无真实依据，曾几何时，那种“热”便容易转为“冷”，甚至激起社会逆反心理。而以笔者所知，这次人们探讨文化及文化史诸问题，并非经由上级领导的组织发动，而是知识界面对现代化这一与国家民族生死攸关的大主题，凭着固有的忧患意识和追求学科发展的愿望，自行启动和展开的，可谓成之天然。这大约报告了两个消息：其一，我国已经出现比较好的学术气氛；其二，我国知识界正在走向成熟。这二者的结合，使得时下对文化问题的探讨方兴未艾，前景可能是乐观的。

把文化问题提到战略高度作理性考察，将文化纳入哲学、史学、文学、社会学思考的行列，这是人类从“古井无波”的中古文明走向波澜壮阔的近代文明的发展趋势。欧洲18世纪启蒙运动诸大师是这方面的前驱先路，19世纪中叶以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更对文化的本质作了科学的阐发，与此同时，西方学术界建立起众多的文化学派，气象蔚为大观。我国走向近代化的历程，步

履维艰，魏源、冯桂芬、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先进的中国人对此作过文化沉思，但正式展开“古今中西”文化论战，并使文化学及文化史研究得以初步开展，则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在本世纪20年代前后的这次文化论战，主要是为着解决中华民族何以救亡图存，中国文化面对“世变之亟”何以自处等严峻的社会问题，而从文化学和文化史的学科发展着眼者寥寥。因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民面临着更为紧迫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任务，并无余裕“坐而论道”，这次极端必要的文化论战只能匆匆收场，与之相伴的学术研究则由少数学人在相当艰难的条件下坚持下去。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种种原因，这类讨论无法展开，以至从建国初到70年代末，冠以“文化”的著作出版不过两三本，这与“泱泱大国”兼“文明古国”的“我中华”是何等不相称！与世界各国在同一时期文化学和文化史研究云兴霞蔚般的盛况相去何止千里！今天，当改革的春风吹拂大地，觉醒了的中國知识界奋起填补这一巨大空档，并在文化学和文化史这一重要领域追赶各国同行，当然是“理之所至，情之所使”，且不论其间包蕴着的更为深广的意义。

笔者自70年代末便决心竭尽绵薄于中国文化史，无奈学力单薄，无以建树。近10年来除完成几部平平的专书外，还撰写了一批卑之无甚高论的文章，其中1979~1983年间的论文17篇以《明清文化史散论》为题，由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有“中国麻省理工学院”之誉的华中理工大学虽以工科为主，却也像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一样，以敏锐眼光投射人文学科，以收“见舞剑，悟书法”之功，这大概是该校出版社有兴趣于笔者文稿的缘故。现在承蒙该社盛意，得以将《明清文化史散论》之后的有关论文再度结集。汇聚于此的17篇文章，系笔者近年对中国文化史诸问题思索的记录，其中既有宏观鸟瞰，也有个案考究，虽多围绕中国

文化特质和中国文化近代转型展开，却并未构成严密体系，故只敢以“断想”命名，又恰与“散论”前后相映。

作者

1988年2月1日

于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

目 录

自序	(1)
关于文化概念和文化史研究的历史考察	(1)
一、文化史的研究对象	(2)
二、文化概念的演变	(4)
三、文化的本质内蕴	(17)
四、文化结构	(20)
五、文化史在历史科学中地位的确立和发展	(28)
汉族文化类型论略	(35)
一、文化类型说的简要回顾	(35)
二、汉民族文化类型的生成机制	(37)
三、以维系血缘纽带为职志的伦理观念构成 汉族文化的中心环节	(46)
中国传统智力论述评	(55)
一、智力界说	(57)
二、智与德	(59)
三、才能与知识	(61)
四、智力与先天素质	(62)
五、智力与“习染”	(64)
六、智力与“好学”、“敏求”	(66)
七、意志、兴趣等非智力因素对智力发展的影响	(67)
八、智力结构诸侧面	(68)
九、智力培养的方法和途径	(76)

十、师承与智力的传递及发展	(80)
十一、智力的检验与测验	(82)
孔子“重政务、轻自然、斥技艺”思想评议	(84)
一、孔学贱视农、工、商	(84)
二、孔学只有拟人化的自然而无科学研究对象的自然	(90)
三、“轻自然、斥技艺”的孔学传统对 中华科技发展的阻滞	(94)
试论儒学的经世传统	(102)
一、“经世”与“入世”	(102)
二、孔学的经世风格	(103)
三、儒学经世两走向——“内圣”与“外王”	(110)
四、秦汉以后儒学经世的复杂形态	(115)
小结	(122)
道光咸丰年间的经世实学	(125)
一、经世意识在顺康至道咸间起伏跌宕	(125)
二、道光咸丰年间经世实学的内蕴	(132)
三、通往近代新学的桥梁	(142)
从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文化到近代新学	(147)
一、“新学”与“西学”是两个有着深刻内在联系 然而又并不完全同一的概念	(147)
二、中国文化在明清之际出现了由“古学” 走向“新学”的最初征兆	(150)
三、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文化在清中叶的沉寂和 在清末叶的复苏	(161)
四、近代新学对早期启蒙文化的继承和发挥	(172)
龚自珍社会批判思想刍议	(183)
一、“世运潜移”之际的敏感士子	(183)

二、词锋凌厉的社会批判家·····	(190)
三、“掌故罗胸”，“有事天地东西南北之学” 的实学大师·····	(204)
结语·····	(214)
具有时代界碑特点的文化人——魏源·····	(216)
一、身世·····	(216)
二、通经致用——“以经术为治术”·····	(222)
三、实政、实功、实行之学·····	(226)
四、向西方寻求经世之道·····	(240)
洋务派与改良派思想交锋的记录	
——读《劝学篇》与《〈劝学篇〉书后》随笔·····	(247)
一、过渡时代·····	(247)
二、《劝学篇》：洋务派应对世变的谋略书·····	(250)
三、《〈劝学篇〉书后》：改良派的治国方案·····	(255)
辜鸿铭——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奇特标本·····	(262)
一、从蔡元培的“兼容并包”谈起·····	(262)
二、学贯中西，言行乖戾的辜鸿铭·····	(265)
“深知民众的心，设法利导，改进”——鲁迅文化观初论 ·····	(271)
一、做解剖传统文化心理的“精神世界之战士”·····	(271)
二、深入追究造成传统文化心理的社会历史原因·····	(282)
三、改造群众中的旧思想、旧习气，与发扬中国民族 优良传统的辩证统一·····	(287)
鲁迅在文化史研究中的创新精神·····	(292)
一、揭示文字、文学“由愚人造成”的历史本来面目 ·····	(292)
二、打破“独尊儒术”的传统，给各种文学流派	

以恰如其份的评价·····	(295)
三、开辟新的文化研究领域·····	(297)
四、严肃认真的治学风格，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299)
鲁迅作品所表现的辛亥革命·····	(305)
一、“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	(305)
二、“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	(311)
三、“此后第一要图，还要充足实力”·····	(317)
文化史研究的一个不可忽视的侧面	
——由传统童蒙读物说开去·····	(324)
《中国学术流变》前言·····	(327)
民族战争文化意义的开掘	
——读《李自成》札记·····	(333)
一、作为《李自成》情节副线的民族战争·····	(333)
二、悲歌慷慨的明廷主战派·····	(335)
三、从崇禎到洪承畴·····	(342)
四、农民起义军对民族战争的态度·····	(349)
五、作为农耕文化“复壮剂”、“补强剂”的游牧文化的	
代表——清朝开国者的阔大气象·····	(351)
评《剑桥中国晚清史》的文化观·····	(356)
一、对西方文化在近代中国双重使命的缜密剖析·····	(357)
二、“冲击-反应”模式的局限·····	(363)
《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从〈三国演义〉看中国古代人才观》序	
·····	(371)
《晚周辩证法史研究》序·····	(373)
《荆楚文化金三角发展模式》序·····	(375)
《半领文学风骚——历史文学创作论》序·····	(378)

《永恒的困扰——文艺与伦理关系论纲》序	(382)
《社会发展地理学概论》序	(390)
《中华文化书系》序	(393)
《求索集》序	(396)
《湖北近三百年学术文化》序	(398)
《谏官与谏官制度》题记	(403)
《中国智慧集萃丛书》总序	(405)
《思之思——20世纪中国文艺思潮论》序	(408)
《宋代状元奇谈·宋代状元谱》序	(410)
《元典文化丛书》序	(412)
《集藏大观》序	(415)
《红楼梦与中国传统文化》序	(417)
《中华草木虫鱼文化》序	(420)
《中国鼓文化研究》序	(422)
《中国文化厄史》序	(424)

博涉旧文 敏求新知

——喜读《中国文化史断想》	萧蓬父 (428)
再版后记	(430)

关于文化概念和文化史研究的历史考察

我们的地球，是太阳系内一个中等大小的行星，它环绕不断进行核裂变、熊熊燃烧的太阳旋转。地球自身的质量所形成的地心引力，足以把贴近它的表面的大气层吸引住；而地球与太阳的距离，使地表温度恰到好处地让水保持液态，今日宇航员从月球或人造飞行器上观察到的地球，是一个由于水的缘故呈现青蓝色的美丽星体。这个星体在广袤的宇宙间不停歇地疾驰，因为包裹着由必要厚度的大气所“缝制”的“宇宙飞行服”，方能抗御宇宙射线对地球表面的杀伤性照射，同时又将有益于机体生存的射线过滤进来，从而造成一个特定的内环境。这里有必要浓度的空气，适宜的温度和湿度，强度适中的太阳能及紫外线，这样，有机生命万分幸运地在这个星体得以充分发展。鉴于宇宙的无限性，我们不能说地球为有机生命提供的这种机遇是绝无仅有的，却可以说是极其难得的，在太阳系内更是独一无二的。而人类，则是地球上有机生命历经漫长进化过程产生出来的“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①，用中国古代哲人的话来说是“天地之心”。人类是自然之子，他们受赐于自然，也受制于自然，同时，人类又超越于自然，能够认识自然并按照自己的意志改造自然，“人之巧乃可与造化有同功乎”^②，自此，我们的地球及周围的空间变成了熙熙攘攘、

①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

② 《列子·汤问》。

充满生机的“人的世界”。一位地理学家曾经满怀诗情地说：“把地球作为人的世界去了解它。”^①这睿智的话语，竟无意道出了我们所要讨论的文化史的真谛。

一、文化史的研究对象

文化史是史学的一个分支，是文化学与史学相结合的一门历史科学。

史学的对象是历史。而广义的历史泛指宇宙间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包括自然史和社会史。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历史科学称作“一门唯一的科学”^②。狭义的历史，则特指自然界中有机生命的最高发展阶段——人类的社会生活的发展史，史学便是记述并探究人类社会进程的学科，它的基本使命是按照时代顺序，通过占有并处理反映历史事实的史料，“述往事，思来者”，“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阐明全部人类社会运动的过程及其规律。具体的史学研究，则可以对人类社会及各国度、各民族、各地域的历史作综合的、分期的或分类的考察。作为史学一个特殊部门的文化史，同其他专门史，诸如社会史、政治史、经济史一样，有着自身的特殊研究范围和使命。

文化史是在文化研究兴起之际，史学向一个宽阔的新领域展拓的产物。它以人类文化发生、发展的总体过程为对象，从而与作为社会知识系统某一支发展史的学科（如文学史、科学史、思想史）相区别；它在研究人类文化发生、发展的总体过程时，尤

① J. O. M. 希罗克：《地理学的范畴与精神》，第79页。

②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0页。

其以人类创造文化时的主体意识（当然这种主体意识受制于种种客观条件）的演变历史为对象，从而又与研究客观的社会经济形态的经济史和社会状貌的社会史相区别。自从人类站立起来、脱离兽类，在自觉意识支配下从事生产劳动，自然界就被赋予人的意义，出现了反映人的意向和活动的世界，文化也就开始了它的一发而不可止歇的生命运动。“社会的人是动物长期发展的产物。但是，只有当人不满足于坐享大自然的赐予，而开始亲自生产他所需要的消费品时，人类的文化史才开始了。”^①同已有亿万经历的宇宙自然史相比，人类文化史“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②；但与人的个体生命时间相比，人类文化史则相当悠久，我们今天所拥有的文化，不是骤然降临的，正所谓“千包万箱，非一耕所得；干天之木，非旬日所长”^③，它其实是人类在过去各时代由交互关系与劳动生活所产生的延续的累积的结果。文化史的任务便在于综合考察这一汪洋恣肆的进程，并探究看似白云苍狗、莫测变幻的文化运动的规律。文化既包括人类活动的对象性结果，也包括人在活动中所发挥的主观力量和才能，因此，文化史不仅要研究文化的“外化过程”，即人类“开物成务”^④，创制各种物化产品，从而改造外部世界，使其不断“人化”的过程，而且要研究文化的“内化过程”，即文化的“主体”——人自身在创造文化的实践中不断被塑造的过程，同时还要研究外化过程与内化过程如何交相渗透，彼此推引，共同促成文化有机整体进步。

因为主体（个体主体和群体主体）居于文化史研究的中心位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27页。

② 《庄子·知北游》。

③ 《抱朴子·极言》。

④ 《易·系辞上》。

置，所以，文化史家历来格外留意于主体色彩鲜明的领域。举凡人的认知系统、艺术语言文字系统、宗教伦理系统、习俗生活方式系统，尤为文化史家所注目倾心；即使是对那些主体性隐而未彰的领域，如科技器物系统、社会制度系统，文化史家也着力剖视潜伏其间的主体因素的创造作用，以及那些外化了的文化形态对主体的再造功能。

文化史既以历史运动中的文化表现和文化锻造人自身的过程为研究对象，那么，这种研究的必要前提便是对文化这一概念作出科学的界定和实在的把握。

二、文化概念的演变

“文化”是一个中国古已有之的词汇，又在近代吸收西方学术思想后，赋予新的涵义。文化概念的演化，决不仅仅只是一个定义变迁的问题，它实际上反映了随着历史的发展，文化内容在日益丰富以及人们对文化的理解向着广延度和深刻度不倦地进军。

中国本土文化在接纳外来异质文化的过程中，引入或改造了许多概念和范畴，从而使中国文化的思想内容和表述方式得以丰富发展。这些新概念、新范畴，或者以音译方式出现，如从印度佛学中音译而来的佛陀、涅槃、菩萨、般若、三昧，从欧洲文化系统中音译而来的逻辑、德漠克拉西、赛因斯、英特那雄奈尔、布尔什维克、苏维埃、华尔兹便属此类。但音译的概念不易为中国人所理解和接受，一般难以在中国文化系统内久远流传，于是又有意译一途，具体办法是借用相关的汉语字、词，或新造复合词。如法、业、戒、色、空、识、相、性等，本是中国所固有和常用的字汇，佛教翻译家们借用这些字汇，表述佛学意蕴，而外来思想便藉助汉语字汇的外壳，不胫而走，广为传播；至于世界、时

间、空间、宗教、哲学、本体、一元、观念、归纳、演绎、民主、自由等词，则是古代佛学翻译家和近代西学翻译家利用汉语单字的某种含义，加以复合，组成新词以表述外来学术的特别涵义。^①今天通用的“文化”一词，便是近代学人在译介西方相关语汇（如拉丁文 *Cultura*）时，借用中国固有的“文”、“化”及“文化”等词汇，加以融铸再创而成的。

在汉语口语系统和典籍中，“文”和“化”是常用字汇。“文”的本义指各色交错的纹理^②，引申为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各种象征符号，进而具体化为文物典籍^③、礼乐制度^④，与“德行”对称的“道艺”^⑤等；又由纹理义导出彩画装饰之意，引申为修饰、人为加工、经纬天地^⑥，与“质”对称^⑦，与“实”对称^⑧；进一

① 关于外来术语传入方式，参见吴怡：《从中国哲学术语谈中国哲学在西方的发展》，国立台湾大学创校四十周年国际中国哲学研讨会论文。

② 《易·系辞下》：“物相杂，故曰文。”疏：“正义曰：若相与聚居，间杂成文，若玄黄相间，故谓之文也。”《说文解字》：“文，错画也。象交文。”王注：“错者，交错也，错而画之，乃成文。”

③ 《尚书·序》：“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④ 《论语·子罕》：“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

⑤ 《论语·学而》：“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汎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⑥ 《尚书·舜典》疏：“经纬地曰文，昭临四方曰明。”

⑦ 《论语·雍也》：“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⑧ 《二程粹言》卷一：“礼者，理也，文也；理者，实也，本也。文者，华也，末也。”